

第一輯

Cultural Studies-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Comparée et Études Interculturell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Lite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张西平 顾钧◎主编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比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师范大学出版社

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文化研究

oe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半 顾钧◎主编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Littérature Compare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Interkulturelle Studien

比较文学と交差文化研究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Littérature Comparée et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第1辑/张西平, 顾钧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675-2568-9

I. ①比… II. ①张…②顾… III. ①比较文学—文集
②比较文化—文集 IV. ①I0-03②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106 号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第1辑)

主 编 张西平 顾 钧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陈小强
责任校对 赖芳斌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68-9/G·7633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跨文化理论研究

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主体应是国外汉学家 张西平 / 3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 王 炎 / 8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姚 斌 / 17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 李 真 / 26

接触与冲突

——马夏尔尼访华使团前后的中英信息场初探(英文) 叶向阳 / 41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

——《饮梦茶馆》的中国叙事与再现政治 黄丽娟 / 69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 张秀峰 / 80

翻译研究

阿列克谢耶夫的《司空图〈诗品〉译注与研究》 柳若梅 / 89

16 世纪“四书”拉丁译文手稿新探 罗 莹 / 100

但丁《神曲》汉译考察 张明明 / 113

教化与启蒙

——明清两部《伊索寓言》汉译本小议 薛维华 / 126

马礼逊圣经翻译的文本分析: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为例 周 哲 梁 颖 / 134

《名公书判清明集》英译本简析 孙 健 / 152

汉学史研究

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丛书选编》(1593)中的中国 Michele Ferrero

(麦克雷) 陆杏译 / 165

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版本价值初探 谢 晖 / 179

久保天随和他的中国文学史 赵 苗 / 189

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历史邂逅

——1935 年梅兰芳在苏联的演出 梁 燕 / 198

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 顾 钧 / 205

略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与主要观点 管永前 / 211

文明的圣地

——约翰·贝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蒋雯燕 / 239

跨文化理论研究

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主体应是国外汉学家

张西平

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外译问题时,我们必须面对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和翻译问题。但迄今为止,如何评价西方职业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当然,对于学术课题,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面对这些争论和不同意见,笔者此处也提出一些看法,与诸君交换意见。

一、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中的地位

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着主导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今天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汉学家这个群体翻译的。^①中国学者进入这个领域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的。

这里我们仅仅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上做一个初步的归纳和统计。

1. 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②中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是继考狄书目后最为全面的西方汉学书目,时间是1926年至1948年。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将在下一篇中展开,这里仅仅是从译者主体的角度对袁书中列举的外国和中国译者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和研究。^③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① 西方汉学从历时性发展上分为: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但实际的历史要比这种划分更为复杂,这样的划分主要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讲的。从个人来讲,有些汉学家是传教士汉学家和职业汉学家二者兼于一身,例如理雅各、卫礼贤。实际上他们两人在作为职业汉学家出现时,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他们的翻译也产生了影响,在历史篇中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即便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一些西方汉学家,其身份也有二者兼于一身的,他们既是汉学家,也是天主教的修会成员。

②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③ 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学者的译著列出,并标出中文名字,这在西方文献学上是一个突破,由此,我们就可以展开对译者的译本统计。以下统计全部摘自《袁同礼著书目汇编2:海外中国学书目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关于《易经》的翻译共有 13 部翻译著作,德文翻译和研究著作 7 部,英文翻译和研究著作 4 部,法文翻译与研究著作 2 部。《易经》的 13 部西方语言翻译和研究著作中,中国人的著作有 4 部,它们是:

(1) 沈仲涛译: *I CHING. The text of Yi king (and its appendixes) Chinese original*,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Z. D. Sung, 沈仲涛. Shanghai, China Modern Education Co., 1935. xvi, 369, ii p. incl. diagsr.

(2) 刘子华(Liu, Tzü -hua): *La cosmologie des Pa koua et l'astronomie modern. Situation embryonnaire du soleil et de la lune. Prévision d'une nouvelle planèvolution des mondes*, Paris, Jouve, 1940.

(3) 沈仲涛著: *The symbols of Yi king; 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 Shanghai, China Modern Education Co., 1934. iii, [2], viii, 159 p. incl. diagsr.

(4) 圆光: *I ging: Praxis chinesischer Weissagung*. Übersetzung besorgte Fritz Werie. München. O. W. Barth, 1951.

这样我们看到在《易经》的翻译上中国学者的翻译和研究占到总数的 30%。

关于《书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 4 部,全部为西方学者所著。

关于《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 12 部著作,只有一部中国学者的译著: Tchang, Tchong-Ming, 张正萌(Chang, chêng-ming). *Le parallelism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 Changhai. Impr. et librairie de T'ou-sè-wè, Zi-ka-wei; Paris., P. Geuthner (1937)。中国学者占《诗经》翻译和研究总数的 0.8%。

关于《礼记》、《春秋》、《左传》的翻译和研究共有 9 部,全部为西方汉学家所著。

关于《四书》的翻译和研究共 113 部,^①其中中国学者独立翻译和研究的有 6 部,它们是:

(1) 《四书》*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ed frn the Chunese texts, rectifi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 by Cheng Lin, 郑麐, (Shanghai, World Publishers, c1948)

(2) 孔子的智慧; 林语堂编译; CONFUCIUS.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 林语堂.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London, H. Hamilton [1938] xvii, 290 p. illus. (map) (The modern library of the world's best books).

^① 这里包含不断再版的版本,这是一个出版总数的统计。

(3) 孔子的智慧;林语堂编译、黄如珍注;CONFUCIUS.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 illustrated by Jeanyee, Wong, 黄如珍.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3] xvii, [1], 265, [1] p. illus. (incl. map) col. Plates. (Illustrated modern library).

(4) 理雅各译本中的孔子哲学;黄如珍注;CONFUCIUS.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 in the translation of James Legge. With illus. by Jeanyee Wong, 黄如珍. Mount Vernon, N. Y., Peter Pauper Press [1953?] 220 p. illus.

(5) 大学和中庸;黄如珍译;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 newly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E. R. Hughes. London, J. M. Dent [1942]; New York, E. P. Dutton, 1943. xii, 176 p.

(6) 论语,庞德译;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and Unwobbling pivot*. Stone text from rubbings supplied by Willian Hawley; a note on the stone edition, by Achilles Fang (方志彤)。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Ezra Poud. (New York, 1951)

从中我们看到,这6部由中国学者参与的《四书》翻译中,其中一部是黄如珍对理雅各译本的注释,一部是方志彤的注释,庞德的翻译,这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合作翻译。林语堂的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成一部,由此,中国学者独立翻译的《四书》只有2部。

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中中国典籍翻译译者统计表

序号	项 目	总数	西方学者	西方学者研究占比例	中国学者	中国学者研究占比例
1	《易经》翻译	13 部	9 部	69%	4 部	31%
2	《书经》的翻译和研究	4 部	4 部	100%		
3	《诗经》的翻译和研究	12 部	11 部	92%	1 部	8%
4	《礼记》、《春秋》、《左传》的翻译和研究	9 部	9 部	100%		
5	《四书》的翻译和研究	113 部	111 部	98%	2 部	2%
6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翻译	151 部	114 部	75%	7 部	5%

2.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王尔敏先生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是继袁同礼先生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的著作。这本书的范围“以西方文字所翻译中国历代文献之书籍篇章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其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①这个目录共收录译者 1219 名,已经查明的中国译者 217 人。^②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仅占译者总数的 5.6%,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 95.4%,在这个书目中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大多数。

我们从历史和语言两个角度说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四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特别是职业汉学家的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了各种西方语言,尽管这仅仅是袁同礼书目中的数字,这里列出数字在于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其中专业汉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主体登上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舞台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主要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

二、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也可看出中国文化翻译的主体是汉学家

外语再好,好不过母语。从语言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仍是各国的汉学家。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说过:“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③一些中国学者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可,其主要立论是从翻译的文化角度展开的。从文化学角度来看翻译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在译本的选择等问题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肯定是有差别的。外语语言能力上一定是汉学家胜于中国译者。从语言的角度,从母语的角度,由本民族学者从事“‘译入’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掌握确实很难达到母语水平”,

① 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页。

② 编者在书中说明,中国学者在西方出版的翻译著作署名全部为罗马注音,这样有些中国学者的姓名回译到中国原名需要核对,书中有一些中国学者中文名字尚无法准确回译成中文,在目录中编者一律注明“未详”。这样的数量在全书中比例很小,我们在统计中将这一部分译者未列入其中。

③ 这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1991)所说,他说:“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 since there are few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 not out of, one's own language.”转引自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译入的翻译,母语使用者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最熟悉、最有发言权、也最理解语言中一些微妙之处”。^① 如果展开视野,中国典籍的外译并非只是翻译成英文、法文等西方语言,同样要翻译成东欧的语言、非洲的语言、亚洲各国的语言,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在西方语言的翻译上有成功的例子外,在其他语言的翻译上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因此,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各国的汉学家,这应该是一个常理,即便是在英语领域我们有了林语堂这样典型的成功例子,但仍然必须承认,中国典籍的英译的主力是西方汉学家,这是翻译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也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从伏尔泰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 - 1976),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 - 1882),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 - 1975),他们都是通过汉学家的译著认识到东方文明的价值,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对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与工作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应该对长期以来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其志业的西方汉学家致以敬意,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西传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①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

王 炎

记得在美国求学期间,很多大学的文学课表上排满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课程,如“身体、话语与权力”、“解构与文化符号”、“福柯与主体理论”、“后殖民、族群与性别”、“权力与霸权”、“空间政治”等等,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单子。学生们趋之若鹜,上理论课的教室常会高朋满座,一座难求。要想修后现代理论课程,特别是有名教授主讲,须尽早注册。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也常冠以各种理论名头,什么“文化与政治”、“语言与权力”、“社会批评理论”,在当时都很时髦。参会者言必称“德里达”、“福柯”、“赛义德”,张口闭口“后殖民”、“晚期资本主义”、“空间”、“记忆”,如不懂这些术语,难免自惭形秽,深恐自己落伍。那时候正值世纪之交,理论如日中天,犹如一股强劲的热潮,涌动在美国大学校园之中。

后来又一次在美逗留,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这时发现美国校园的理论潮降温了。课程表上依然有不少理论名称,但主要是开给本科或研究生低年级(课程编号较低)的介绍性课程。学术会议和讲座仍然热闹非凡,但学者们不再频繁引用著名“后”理论家了,相反,有意无意回避提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后现代术语似乎融化在问题里了,学者们也不再刻意搬弄理论话语了。具体问题反而越来越凸显出来,论文题目或会议主旨大多围绕研究对象,关注问题而不是概念先行。这次与美国学界的交往,我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理论从前景转入背景,后现代思潮已经内化在学者思考之中。无论是后结构、后殖民、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新历史主义,都已悄悄地进入学界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谁也无须再摆术语“龙门”,或吞剥、模仿拗口的理论词条,“后”理论已经成为常识。在学者讨论问题的思路中,不经意已透出方法的转向,而无须大声呼吁后现代的君临。

不到十年,我感到美国理论话语的微妙变化。有意思的是,与身在其中的美国学者交谈,他们反而感触不深。也许实为日濡月染的渐变,对他们来说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但我却想弄清个究竟,几十年的后现代洗礼,对美国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给美国学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近十年的转变是否预示了“后”理论的前景?这对中国学界反思“后学”有什么借鉴?因参与一个社科项目,几年来整理了 1980 到 2000 年美国文学理论的大量文献,颇有些心得,便从主观视角出发,就管窥所及,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美国学界遭遇理论的历程。

一、传统文学批评

美国学院接受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明显晚于欧洲。事实上,研究与传播理论的学者大多有欧洲学术背景,要么是来美国的移民,要么到美国讲学。大约在1960年代末,美国学院才开始重视外国学术的引进,特别对欧洲大陆哲学思辨传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一种叫“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新学科悄然兴起。

传统美国文学批评偏向于感悟式、实证性的文本注释,特别强调作者的语言天分与道德真诚,欣赏个人学养与文化底蕴,炫耀矫揉造作的盎格鲁—美国式“智性优雅”(intellectual gentility)。(De Man: 6)在欧陆理论大举进入之前,艾略特(T. S. Eliot)式的传统“新批评”(New Criticism)与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新保守主义,统治着美国文学批评界。(De Man: 6)但如果说“新批评”时代,美国学界没有欧陆文学思潮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50年代,德国语文学(philology)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大师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史皮策(Leo Spitzer),以及人文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等,都塑造着美国文学批评的生态。(De Man: 6-7)究其缘由,这仍是一条人文批评的线索,其内在逻辑与美国新批评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相互印证。

二、理论转向

直到1960年代,美国批评界才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追根溯源,是因为欧陆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各种新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女性研究、新历史和新马克思主义相继出现,改变了整个欧洲文学的方法。欧洲学者与美国学界交流频繁,启发后者从单一美学或历史学方法中跳出来,转向关注文本意义之外的领域:即经典文本的产生过程、读者接受过程,以及文本经典化之前的评价等。(De Man: 7)美国学界开始意识到,纯粹的审美标准并非名著经典化的唯一尺度,审美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远比所谓“人类的永恒价值”要复杂得多。审美标准并不天然地内在于文本内容之中,毋宁说,审美乃是某一历史语境中文本意义所产生的效果。(De Man: 7)当文学权威在把一文本经典化时,会有各种文化权力参与到文学评价的场域中,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是权力博弈的结果。

除了这种社会学视角之外,语言学和文学元语言方法的引入,也改变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图景。传统美国评论界分析文本时,强调从直觉、意识和经验出发,以内容逻辑的严密、意义明晰为判断标准,把审美视为不二法则。(De Man: 8)当语言学方法进入美国批评视野之后,有些学者开始借鉴语言学的科学方法论,寻找文学

评论的确定性。于是,一股文学实证的研究思潮出现了。更有学者借鉴索绪尔语言学的视角,思考语言的指涉性,或者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此之后,每当分析一个文本时,语言学就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批评家不再把语言仅仅当成给定的作者意图,而是一套符号与意义系统。语言系统给文本带来表面上的确定意义,传统直觉和体验式解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文学语言与功能性语言之间的藩篱被彻底打破了,文本经典化的神秘面纱也被无情地揭开。(De Man: 8-9)

如果说美国文学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只强调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那么,自 60 年代起,学界就开始质疑阅读本身的问题了,特别是作者意图、人格化的“自我”等问题,尤为突出。(De Man: 17)于是,“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在美国批评界崭露头角,姚斯(H. R. Jauss)和沃尔夫冈·伊塞尔(Wolfgang Iser)等欧陆接受理论,占领了美国大学的一席之地。这种美学和语法研究,试图借传统解释学(hermeneutic)给美学批评招魂,通过改善批评手段让传统美学更加健全和缜密;但“接受理论”没能突破传统人文学,至多不过回避了新批评内在的困境而已,犹如鸵鸟藏头入沙,只不过悬置了美学批评存在的问题。(De Man: 18)

三、后现代理论的兴起

还有另一条线索与“接受美学”同时进入美国学界,那就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等后现代理论。这一波浪潮来势凶猛,伴随 1960 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和法国“五月风暴”,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后”理论矛头直指西方人文传统,要颠覆学术体制与权威话语。美国传统学院势力全力抵抗理论的入侵,反对放弃人文传统,坚持至高无上的美学理念,即超越历史的审美情趣与永恒的哲学价值。保守派往往指责理论派为好战的社会活动家,为文化的政治化提供武器。他们拒绝更新文学课程,压制学术体制改革的呼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越抵制“后”理论,理论反而越火爆。各种理论显影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学院的全过程,挑战学术体制的基本构架,即学科设置与专业划分。还质疑学术评价的基本范式,冲击了维护体制的话语权威。

直到 20 世纪 70 与 80 年代之交,新、旧(或称左与右)两股学术势力的角逐渐渐尘埃落定,新派——后现代理论明显占了上风。美国学院权力开始与理论派磨合、“协商”(negotiate),最终妥协了,慢慢调整了自身的权力结构。理论造成的冲击、动荡也渐渐修复,人文学科以渐进的方式,接受了后现代所带来的变化,传统学术固有的吸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强了。另外加上多元文化大潮的冲击,美国学术机构趋向于更宽容、柔性,越来越善于顺应历史的变革。(Zavarzadeh

and Morton: 38)从手头上整理的1980年到2000年美国批评理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21年间,文学批评界各流派比肩接踵,彼此交错,相互推动,构成美国文学批评的洋洋大观。

比如在1980年尤金·H·福尔克(Eugene H. Falk)著书《罗曼·英迦登的诗学》(*The Poetics of Roman Ingarden*),这本批评专著仍尝试人文学的方法,以英迦登的美学解释学分析文本,想为美国文学批评寻找新出路。而西伊利诺伊大学英语系教授辛蒂·M·康格(Syndy M. Cong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W·J·T·米切尔(W. J. T. Mitchell)则在同一年出版了叙事学著作,在实证的路径上尝试突破传统美学,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批评寻找科学的确定性。

次年,蒙大拿大学乌拉迪米尔·克里辛斯基(Wladimir Krysiniski)教授从自身俄罗斯文学背景出发,出版了《符号学探索:现代小说论文集》(*Approaches to Semiotics: Essays on the Modern Novel*),提倡把俄国形式主义和符号学运用到分析文本。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教授却编写了一本《对文学的攻击以及其他论文》(*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聚拢各家保守观点,一致声讨理论对文学的冲击,维护传统新批评的声誉,充当不合时宜的顽固派。不难看出,在1980年代初美国文学评论的舞台上,活跃着人文美学、符号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众声喧哗,此消彼长,并驱争先。

1987年,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撰写了《贞操文本:小说、性欲与意识形态》(*The Virgin Text: Fiction, Sexuality, and Ideology*),以女性主义视角,从政治意识形态入手,解构经典文本产生的背后,资本、欲望与异化所建构的虚伪现实。似乎是逆风而动,两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教授著书《反对解构》(*Against Deconstruction*),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大加鞭挞。与之呼应,弗吉尼亚大学彼得·贝克(Peter Baker)著书《解构与伦理转向》(*Deconstruction and the Ethical Turn*)(1996),质疑解构主义是否关怀伦理问题,激烈地批评“后”理论的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四、反思“后”理论

虽然还有韦勒克这样的保守力量,希望美国文学仍回到“新批评”的老路上去。但从1980年代之后,理论已牢牢控制了美国文学批评界,有识之士不会希望走回头路,但也要反思“后”理论盛行所遮蔽的问题。特别在199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渐渐萌生出“反概念化”(anti-conceptualism)的倾向,出现了所谓“反理论的理论”(anti-theory theory)。主要观点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不过是学院内部为应对全

球资本对学术体制的冲击所做出的姿态,不会去彻底清算知识生产的机制和体系,只不过有些小修小改而已。(Zavarzadeh & Morton: 49)究其根源,“后”理论也需要现存体制为其传播、复制和推广提供渠道,同时,现存的权力安排和生存逻辑恰好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Zavarzadeh & Morton: 38)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斯尤德·扎瓦扎德(Mas'ud Zavarzadeh)教授与唐纳德·莫顿(Donald Morton)合著一本《作为抵抗的理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政治与文化》(*Theory as Resist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after (Post) structuralism*),观点很犀利,整体性地批判了“后”理论。他们指出,当代美国大学体制与一切资产阶级体制一样,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之下,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加之学院私有化的大趋势,迫使大学越来越注重体制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后现代的兴起,不过给学院提供了“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机制。(Zavarzadeh and Morton: 89)玄而又玄、不知所云的理论术语之所以备受学院青睐,与时髦理论既能宽容多元与差异性文化,又可以抵消对体制的彻底颠覆有关。(Zavarzadeh and Morton: 89)扎瓦扎德与莫顿之所以如此尖锐地质疑理论,是因为他们眼中的美国大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构,两者同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不仅制造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意识形态,还塑造着维护资本运转的主体——大学生。

当回顾美国学院体制历史时,他们认为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大学曾修改高雅的精英课程,降低格调去塑造实用型人才,以便适应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墨守成规的技术员或简单重复的劳动者。(Zavarzadeh & Morton: 122)传统经典文本宣扬的个人自由,被高等教育降格到自由市场之内,变成个体挣脱经济与社会束缚,自由进行市场交易,但同时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即公民道德与法律(或曰现存政治制度)。(Zavarzadeh & Morton: 130)欧洲启蒙精神所伸张的批判意识,也被简约到个人经验层面,小心翼翼地回避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知识分子一般把“自我”(self)与“自由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奉为最高价值,但美国高等教育却把自由主体贬低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既要参与创造资本需要的意识形态,还要确保掌权的资产阶级对真理话语有最终裁断权。(Zavarzadeh & Morton: 130)

分析了美国现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之后,扎瓦扎德与莫顿便把矛头指向后现代理论的产生机制,对美国学院体制的深层结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后现代资本主义,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以跨国公司的多民族经济为特征,全球经济需要多元文化和不连续的主体。(Zavarzadeh & Morton: 145)后现代理论家与保守人文学者论战中,都意识到了